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

记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于省吾教授

王 中 明

于省吾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他在甲骨文金文释读、古籍校订、先秦诸历史问题研究方面成就卓著，为国内外学术界所钦佩。他在数十年潜心治学的道路上，洒下了辛勤的汗水，为中华民族，为子孙后代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位八十八岁的老学者，迄今仍然在科学研究和教学的领域里努力耕耘，勤奋浇灌，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古文字学研究，以其惊人的顽强毅力正在开辟着古文字学研究的新领域。

于省吾教授，字思泊、号夙兴叟，斋名双剑谿、泽螺居。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生于辽宁省海城县中央堡。现任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中国古文字学会常务理事（该会不设理事长），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吉林省书法学会会长，吉林省政协常委等职。

于省吾教授的小学和中学时代是在辽宁省海城渡过的。中学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奉天高等师范学校，二十三岁毕业。毕业后曾在奉天省教育厅奉职。由于学业优异，受到张学良的器重，一九二八年，授予他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咨议职称。为了开化东北，传播国学，一九二九年在张学良的捐款资助下，

于省吾教授参预了创办“萃升书院”的工作。“萃升书院”是专门研究国学的高等学校。“萃升书院”创办后招聘了国内学术界、教育界第一流的知名人士做为该校的教师。因此，这所学校名气大盛，吸引了国内外许多著名学者，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于省吾教授原来是研究古典文献的，擅长作桐城派文章，三十岁时就出版了一本文集。后来他觉得作桐城派文章往往内容贫乏，形式刻板，流于空洞，于是便对甲骨文金文研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北形势急剧恶化，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明显地暴露出侵吞整个东北，进而灭亡整个中华民族的狼子野心。做为一个热爱祖国的学者，于省吾教授开始考虑自己今后的去向。为了避免卷入伪满洲国的旋涡，他毅然变卖了在奉天的家产，辗转迁居到北京。在大敌当前，中华民族危难之秋，于省吾教授心焦如焚。他以极其强烈的爱国热忱，发愤用自己的全部资产搜集我国古代稀有的甲骨碎片、陶器碎片及各种青铜器、古玺、古币等历史文物。他把这些收集到的历史文物作为国宝加以珍藏，为保护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立了大功。从此，于省吾教授即和先秦古文字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他在甲骨文、金文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在北京期间，辅仁大学特聘请他去做讲师。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燕京大学又聘请他去做名誉教授。于省吾教授在甲骨文、金文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已为学术界所公认。此后四十余年，他一直在甲骨文、金文研究的崎岖小路上攀登，并取得了令人叹服的巨大成就。自一九三三年，于省吾教授写出自己第一部二十余万字的古文字学专著《吉金文选》后，又先后写了《双剑谿尚书新证》（一九三四年）、《双剑谿吉金图录》（一九三四年）、《双剑谿诗经新征》（一九三五年）、《双剑谿易经新证》（一九三六年）、《双剑谿古器物图录》（一九四〇年）、《双剑谿殷契骈枝》（一九四〇

年)、《双剑詒殷契骈枝续编》(一九四一年)、《论语新证》(一九四一年)、《双剑詒殷契骈枝三编——附古文字杂释》(一九四三年)、《商周金文录遗》(一九五七年)、《双剑詒诸子新证》(一九六二年)、《甲骨文字释林》(一九七九年)等十三部专著以及七十余篇论文。

于省吾教授和郭沫若同志是亲密的朋友。他们都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尽管他们在古文字学研究领域里有着不同的学术见解,然而在为共同事业的奋斗中却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郭沫若同志被迫流亡到日本,并开始从事甲骨文字研究。在日本流亡期间,由于缺少甲骨文资料,郭沫若同志曾频繁地与于省吾教授通信联系,索取甲骨文拓片。在极度困难之中,于省吾教授总是千方百计设法满足郭沫若同志的要求,给他以极大的援助,多次给郭沫若同志寄去甲骨文拓片的照片。郭沫若同志在给于省吾教授的信函中表露出对于省吾教授的感激之情,并表示要“得当以报”。他们两人之间还多次交换过自己学术著作和研究论文,互相切磋,共同勉励,一起探讨甲骨文研究的艰深课题。郭沫若同志对于省吾教授的学术见解及研究成果十分赞赏,并谦虚地表示“十分钦佩”。于省吾教授至今仍然珍藏着郭沫若同志在日本时给他的七、八封亲笔信函。他们之间的友谊是真摯的。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郭沫若同志来到北京,邀请唐兰等研究古文字学、中国历史的几位专家学者在于省吾家聚会,济济一堂,开怀畅述,共同祝愿新中国的即将诞生。

《殷契粹编》一书是郭沫若同志流亡日本时研究甲骨文成果的汇辑。限于当时经济上的困难,印刷数量很少。一九六五年再版重印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特邀请于省吾教授对此书进行了全面的校改。郭沫若同志将于省吾教授校改之处,均录入该书眉端,总计有十余处,并在该书前言中说明了这一情况。郭沫若

同志的另一部研究甲骨文著作《卜辞通纂》也是请于省吾教授进行全面校改的。于省吾教授和郭沫若同志是古文字研究领域里两位并驾齐驱的大师。在他们两位老学者之间，既有深厚的友谊，又有学术上的各抒己见。他们在古文字学研究的领域里都有自己独特的建树。

解放后，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当时没设古文字课。时值匡亚明同志调任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校长。北上途中，匡亚明同志到处查访，广为招聘人才。逗留北京期间，由顾颉刚同志推荐，亲自邀请于省吾教授到东北人民大学任教，于省吾教授欣然同意。一九五五年六月，于省吾教授正式奉调到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任教授职务。由于他年纪大，为了照顾他身体，学校领导没有安排他上台讲课，只让他专门培养研究生。每期两名。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五年期间先后带出研究生四名，这四位同志现都已成为国内研究古文字学的重要骨干力量。一九七八年，教育部又恢复了研究生制度，于省吾教授老当益壮，继续挑起了培养研究生的重担。一九八〇年，又受教育部委托主持了全国高等学校讲师以上水平的古文字进修班工作。“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于省吾教授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倾注到培养年轻一代古文字学工作者的事业上了。

研究古文字的书具有高、深、专、窄的特点。为了解决教学用书奇缺的问题，一九七七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了一个甲骨文合集编撰小组，由郭沫若同志任主任委员，开始集体编撰《甲骨文合集》一书。于省吾教授也是编撰小组成员之一。此书决定由上海中华书局正式出版，三年出齐。书中收录全国较全的甲骨文拓片五万五千片，共十三巨册。这是建国以来，在古文字学研究方面工程最大的一次举动。该书可以说是一部集甲骨文资料之大成的著作。

一九七八年，由于省吾教授倡议，吉林大学历史系古文字研

究室和中华书局联合发起全国古文字学讨论会，宣布成立全国古文字学研究会。会议代表一致推选于省吾教授为全国古文字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该会不设理事长）。一九七九年四月，中国考古学会在陕西省西安市召开成立大会。于省吾教授抱病参加了大会。大会一致推选他为执行主席，并由他主持了开幕式。在这次大会上于省吾教授被选为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

一九七九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于省吾教授的《甲骨文字释林》一书。这本书是于省吾教授四十余年从事甲骨文字专门研究成果的结晶。书中共收录了一百九十余篇文章，包括目录在内，将近二十万字。精装影印，十六开本，印数六千册。据查解放后三十余年，全国已经释读出的甲骨文字不超过二十个。《甲骨文字释林》一书解决了一大堆疑难问题，其中新释或纠正过去误释的疑难甲骨文字将近三百个（包括解放前释读出的近五十个字在内）。解放前，于省吾教授共释读出九十余个字，在《甲骨文字释林》出版时，本着宁缺勿滥的原则删去了四十余个。可见于省吾教授治学态度是多么严谨。删去的四十余个字中有一些仍然是很有价值的，应进一步研究肯定下来。我国现在已发现的全部甲骨文字共四千多个。经过八十多年的研究，只释读出一千多个字，其中于省吾教授的研究成果就占了四分之一左右，可见其功力之深。于省吾教授的治学态度是极其严肃认真和实事求是的。他历来提倡写短文，反对故意把文章拉长。文不在长短，主要看是否言之有物，对那些空洞的长文章，于省吾教授是十分反感的。于省吾教授自己在作文章时就信守这条原则。他的《甲骨文字释林》一书所收录的一百九十余篇文章，平均每篇文章只有千字左右，最长两三千字，短的只有几百字。

于省吾教授所以能在甲骨文字研究等方面取得惊人的成果是和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治学方法紧密相关的。这是他在几十年治学过程中亲身探索出来的成功之道，这是极其宝贵的精神

财富。

于省吾教授的治学方法首先是持之以恒。他从三十六岁到北京后就一直从事甲骨文字的专门研究，四十余年从未间断过。他每天坚持早晨三点钟起床，中午睡三个小时觉，晚上九点钟就寝，每天工作时间最少在六小时以上，星期天、节假日也很少休息，一年四季始终如一。其次是严谨。于省吾教授对一个字的形、音、义怎么合，都要认真地反复地加以琢磨，进行综合研究。所谓形，即字的构形，字是由什么偏旁组成的；所谓义，即在古文献中怎样讲，含义是什么；所谓音，即古读什么音。形对了，音和义就好办了。他还重视对社会背景的研究，从不主观猜想和推测。他认为科学研究是十分严肃的事情，不能靠押宝，一定要证据确凿，叫得准，打得实，似是而非不行，否则绝不立论。

于省吾教授研究甲骨文字的方法一是要熟悉；二是要注意偏旁的变化规律，即文字发展变化的源流；三是要与社会性质和历史发展情况相印证。他认为一个字为什么这么写，字是怎么造的，要做到会识、会讲、会读音。造字的起源往往和少数民族制度有关系。各个少数民族原始社会都有雷同之处，所以各个少数民族的造字起源往往也有共同的特点。他还认为要用古典文献和地下考古发掘材料做为旁证。古典文献应以先秦的文字为主，因为秦以后的文献演变比较大。由于地下考古发掘的材料是千古不变的，所以显得十分重要。研究甲骨文字必须采取辩证的科学方法。和研究甲骨文有关的其他学科都要懂一些，要有丰富的常识，知识面要广博，孤立地搞甲骨文字研究是不行的。甲骨文字、古典文献、少数民族志、地下考古发掘材料都是互相联带的。对同样一个字，各种材料都是怎么说的，互相比较一下，对证一下，看一看究竟谁说得对。于省吾教授写文章有一个规矩，首先让别人看几遍，审核一下。有时也让研究生看，尽量让他们挑错，一般稿成后不马上发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后，再进行反复修改，认

为确有把握后，才能送出去发表。他认为一部著作或一篇文章一旦正式发表了，就要站得住脚，不但当时站得住脚，传之后世也要站得住脚，要对社会负责，要对他人负责，要对将来负责，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于省吾教授在研究甲骨文字时突破了大家熟知的汉字造字方法“六书”说。汉字造字“六书”说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汉字的组成越不出这六个范畴。但在研究甲骨文字时仅仅局限在这六个范畴内是不行的。汉字的独体字，一般都象形，如牛、马、羊、虎等。有一些独体字上半节带音符，下半节带形符。说是象形字，为什么带音符；说是形声字，为什么又是独体字。形声字有两个以上偏旁，其中有一个是音符，如“钉”字，“金”是形符，“丁”是音符。于省吾教授发现有的独体字半截是音，另半截是形；说是形声字又必须是两个偏旁，说是独体字，又无声。因此，不得不突破“六书”说的范畴，提出了“附有音符的独体象形字”的独特见解。

于省吾教授在研究古文字的过程中，不单解决了文字的释读问题，还通过对古文字材料本身的研究，进一步探讨文字的含义和当时的社会性质。在研究甲骨文字时，他对商代的社会性质进行了探讨。史学界一般都笼统地把商代说成是奴隶制社会。但他在对甲骨文字的研究中发现商代前期，特别是在武丁时期的统治者几乎天天要杀死战俘，用以祭祀祖先和天地鬼神，杀几个人，几十人，几百人不等，最多一次竟杀死了一千人之多。奴隶主是把奴隶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的，要靠他们创造价值，一般是不大量杀死奴隶的。于省吾教授把他的研究成果撰写成六万余字的论文，提出商代前期还不是奴隶制社会的观点。这一观点引起了史学界的普遍注意，许多人对他提出的观点表示十分赞赏。

于省吾教授认为三十岁至四十岁期间，是一个人在治学道路上最关键的时刻。搞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如果能在三十岁至四十岁

期间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这对于他一生的科学研究工作将是十分紧要的。一个人要特别珍惜自己的青年和中年时期，否则无论条件怎样优越都将一事无成。做为一个青年人，自学能力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有良师的正确指导进步会更快。搞科学研究的道路是十分艰难的，没有顽强的毅力和始终如一的钻研精神也是不行的。从事科学研究还要有专门的时间，要集中精力。青年人在科学研究中，不能只凭个人兴趣和爱好，选题不能太杂，要及早确定研究方向。在科学研究的崇高事业中要有勇于献身的精神。

于省吾教授十分爱惜人才，热心于人才培养工作。他对研究生的培养原则是因材施教。一开始不讲得太深，一定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因为青年人一般文献底子都比较薄，看书少，研究方法也不够严谨。他在教学中从不似是而非，做到有理有据，就象瓦匠砌砖那样，无论放到那里都要丝毫不差，稳而不动。象他这样年纪的人已很少亲自登台讲课了；但他却不然，还要坚持每周亲自上台讲两个半天课。他认为请别人代讲固然可以，但总觉得自己能亲自讲更好。亲自讲能直接了解学生学习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加以及时处理和解决，教学效果好。于省吾教授不仅向学生传授知识，还把自己多年从事治学活动的宝贵经验和行之有效的方法毫无保留地介绍给学生。他认为这一点特别重要。他经常告诫自己的学生，在从事写作以前一定要下苦功打好基础，不要仓促动笔，急于求成。我国甲骨文字研究工作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了，所出专著也有一百余种。他建议学生要将前人研究甲骨文字的全部成果都看一看，并要求做到基本掌握，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只有这样才能明辨真伪，才能目标明确地进行新的探讨。在没有搞清敌情之前，决不打无把握之仗，否则必将事倍功半。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是没有捷径可走的，只有功夫到了家，才能瓜熟蒂落。

于省吾教授对待科学研究事业是胸怀坦荡，气度不凡的。他

高瞻远瞩，把科学研究事业从个人狭小的天地里解放出来，看作是千百万人的大事业。他经常向有关方面多次呼吁，要尽快地造就大批的新的生力军，不断地开创科学研究的新局面。造就人才，刻不容缓。于省吾教授非常器重年轻而有作为的科学研究工作者。对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崭露头角的青年人，他总是尽力提携，象园丁莳弄花木那样，勤于浇灌、施肥、修剪，期望尽快成材。他历来主张学生应当超过先生，反对在学术研究上的保守思想和学阀作风。他自己正在身体力行地做好传帮带，同时鼓励青年人要勇于后来者居上。革命事业总是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于省吾教授不仅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而且积极地为它推波助澜。

于省吾教授的业余爱好也是比较丰富的。他喜欢收集一些邮票。他集邮的特点是不花费专门的精力去收全，也不追求数量的多少，只是随手从国内外的一些来信上收集的。他特别酷爱古代文物的收藏和研究。他把收集邮票和古代文物不只是看作业余的一种消遣，而是通过对这些艺术珍品的鉴赏，陶冶自己的情操，提高艺术修养，丰富知识，从更广阔的角度去认识和了解世界和社会，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进一步激发自己热爱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感情。他认为这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健神健脑的活动，是一种美德。解放前，他苦心收集了一些古代稀有历史文物，其中有珍贵的有吴王夫差剑及吴王光戈等。解放以后，于省吾教授将这批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慷慨地捐献给国家，共计二百余件。

于省吾教授是健身有术的。他之所以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科研与写作，至今身体良好，是和他常年坚持锻炼身体，节制不良生活习惯密不可分的。他认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因此，凡与身体有害的不良生活习惯，他都能加以节制。他从前在从事研究与写作时是经常吸烟的，每天吸十几支。吸烟时尽量吸带过滤嘴的，同时还要加上一个自制的烟袋嘴，里面放上过滤用的棉花。后来

他从报刊上看到许多介绍吸烟有害的文章，于是决心戒烟。为了彻底戒烟，他不许孩子再给他买烟，并把吸烟用具全部取掉。戒烟以后，他感到精神清爽，体力充沛，工作起来劲头更足了。他把个人戒烟的体会告诉给学生，并经常教育学生也不要吸烟。

于省吾教授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晨三点钟起床，五点钟进早餐，九点钟外出活动。活动的方式是疾步走，有时顺便到街上买点菜。中午睡一觉，晚上坚持做身体按摩，九点钟准时就寝。于省吾教授是从四十五岁时开始做健身按摩的，一直坚持到现在，从未间断过。每次按摩做半个小时。方法是用手大力摩擦四肢、眼、鼻、嘴、头、胸、腹、脚心等身体各部位，后背用毛巾摩擦。由于几十年坚持按摩，大大提高了身体素质，现在虽然八十多岁高龄，但血压正常，耳不聋眼不花。

甲骨文的研究工作是比较艰难的，往往用力多，收效小。现在已经释读出来的甲骨文不到三分之一，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等待着人们去做。于省吾教授制定了今后的工作计划和研究方向：一方面继续带好研究生，另一方面要扩大古文字研究的领域。在甲骨文字研究中，他又有了一些新的见解，写了十多篇文章，总计有二、三万字。近一两年内，于省吾教授想写一本《金文释林》，材料基本都准备齐了，估计有二十万字左右。他还计划研究石刻文字、古陶器文字、古货币文字、竹简文字、帛书文字、古玺文字等，拟写一本《古文字释林》。他还想组织人，在时机成熟时编写一部工具书——《古文字辞典》。

在学术研究的领域里是无止境的。这位立志献身古文字学研究事业的老学者，只要他没有躺下，总是顽强地做下去，在科学研究的征途上，他正在向新的高度攀登。